

刘师培的文体学思想及其 研究方法刍议*

柯镇昌

【提要】刘师培在不长的学术生涯中,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论著,其中多与文体学相关。他通过对“文”的考辨,论定骈文为文体之正宗,由此对各种相关文体进行了溯源和辨析。刘师培认为文体与时代而迁变,不同文体间存在互动关系,同一文体内部也会不断形成变易,指出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刘师培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与文章学研究的紧密结合,同时注重实证,善于借鉴古今中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由此做到言必有据。在他的研究过程中,透露出深深的历史责任意识,使得其研究成果具有着特别的历史厚重感。

【关键词】刘师培 文体 文章学 骈文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I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5)04-0093-07

上世纪初期,国运衰弊,民族困顿,在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回首的时代,却活跃着一群为民族文化努力献身的学人,刘师培无疑是其中较为耀眼的一位。在刘师培不长的学术生涯中,留存了大量的文学论著,其中著名者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论文杂记》、《文说》、《文章源始》、《文心雕龙讲录》等。^①尽管上述成果的研究视域是面向整个古代文学,但大部分内容却都与古代文体学密切相关。本文正是在研读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对刘师培的文体观及相关研究方法作一尝试性探寻。

一、“骈文为文类之正宗”的文章辨体观

刘师培在《文章源始》中提出:“骈文一

体,实为文体之正宗。”其《文说·耀采篇》又云:“是则骈文之一体,实为文类之正宗。”以骈文为正宗,是刘师培文学辨体观中的最大特色。为了证明骈文在文学中的核心地位,他首先从小学入手,对“文”字的本义进行了辨析。《文章源始》指出:“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论文杂记》

* 本文为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规划一般项目“先秦汉魏晋文体理论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BZW090)的阶段性成果,得到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一般项目“战国散文文体研究”(14WX10)资助;受九江学院庐山文化传承与传播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① 本文所列刘师培所撰书籍见于:(1)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全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2)刘师培著、刘跃进讲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卷10云：“盖‘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故道之发现于外者为文，事之条理秩然者为文，而言词之有缘饰者，亦莫不称之为文。”“夫文字之训，既专属于文章，则循名责实，惟韵语俚词之作，稍与缘饰之训相符。故汉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编辑《文选》，亦以沉思翰藻者为文。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在《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二章《文学辨体》中，刘师培通过梳理中古时期的文笔之争，再次对“文”的内涵进行了细致考辨：“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盖文以韵词为主，无韵而偶，亦得称文。”“盖笔从‘聿’声，古名‘不聿’，‘聿’、‘述’谊同。故其为体，惟以直质为工，据事直书，弗尚藻彩。”又《文说·耀采篇》云：“自古迄今，文不一体。然循名责实，则经史诸子，体与文殊；惟偶语韵词，体与文合。”综上可知，刘师培认为“文”的本义与修饰有关，只有经过修饰润色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文，经过修饰锻炼的文章在形式上表现为偶语韵词，因此，讲究偶语韵词的骈文就是“文”的代表。《文说·耀采篇》列举了许多古代优秀作品，认为它们才是文章之正宗：

故《三都》、《两京》、《甘泉》、《藉田》，金声玉振，绣错绮交，赋体之正宗也；宣公兴元之诏，文饶《会昌》之集，文赡义精，句奇语重，制敕之正宗也；刘琨《劝进》，庾让《辞官》，婉转以陈词，雍容以叙致，书表之正宗也；中郎《太丘》之碑，魏公《李密》之志，流郁以远气，俊伟以佐才，碑志之正宗也；玄晏扬太冲之文，彦昇述文宪之作，以及“曲水流觞”之叙，“落霞孤鹜”之文，序文之正宗也；赵至《入关》之作，鲍照《大雷》之篇，叔庠擢秀于桐庐，士龙吐奇于鄞县，游记之正宗也；班彪《王命》，叔夜《养生》，干宝《论晋》，贾生《过秦》，论体之正宗也；颂则《出师》、《中兴》，铭则《燕然》、《剑阁》，箴则子云《百官》，赞则刘向《列女》，莫不音中群雅，语异聱牙，颂铭箴赞

之正宗也；孔璋《檄魏》，宾王《讨周》，檄文之正宗也；士季之《酌诸葛》，义山之《祭伏波》，祭文之正宗也。

上述所列文体，基本都注重形式而讲求对偶押韵，正是其“骈文为文类之正宗”文体观的直接体现。刘师培在推崇骈文的同时，有意将单行散句的文章排除于“文”外，认为这样的作品是不足以称之为“文”的。《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二章《文学辨体》云：“故昌黎之作，在唐称笔；后世文家，奉为正宗；是均误笔为文者。”《文说·耀采篇》：“至韩、柳修词，欧、曾循轨，以散行之体，立古文之名。然三代之时，文与语别，六朝以降，文与笔分。若屏斥偶体，崇尚奇词，是则返朴归真，力守老聃之论，舍文从质，转追棘子之谈，空疏之讥，詎可免欤？”《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云：“宋代以前，‘义理’、‘考据’之名未成立，故学士大夫莫不工文。……至宋儒立‘义理’之名，然后以语录为文，而词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据’之名，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夫以语录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笔之于书，以其多方言俚语也；以注疏为文，可笔于书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无抗堕抑扬也。综此两派，咸不可目之为文。”总之，在刘师培看来，韩、柳以来的散句为主的古文、宋代以来的语录体以及清代盛行的以考据或注疏为旨的学术文章，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唯有讲求修饰的骈文才是文学中之正宗。由此也不难理解，在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等文学论著中，更多的内容都是侧重于骈文的论述。

在“骈文正宗”文体观的促使下，刘师培还尝试对中国古代文章进行分类。《论文杂记》首卷，他在印度佛书分类的感发下，将古代文章区分为三大类：“一曰文言，藻绘成文，复杂以骈语韵文，以便记诵，如《易经》六十四卦及《书》、《诗》两经是也；是即佛书之经类。一曰语，或为记事之文，或为论难之文，用单行之语，而不杂以骈俚之词，如《春秋》、《论语》及诸子之书是也；是即佛书之论类。一曰

例，明法布令，语简事赅，以便于民庶之尊行，如《周礼》、《仪礼》、《礼记》是也；是即佛书之律类。后世以降，排偶之文，皆经类也；单行之文，皆论类也；会典、律例诸书，皆律类也。故经、论、律三类，可以该古今文体之全。”刘师培受佛书分类启发，当属灵感所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中国古代书籍的实际，如果以此来对中国古书进行分类，大部分书籍都各有所属。这种分类的方式主要是依据文章的形式：一是骈语韵文；二是单行之文；三是语简意赅者。以此分别对应三大文类：经、论和律，而这三大文类又是以社会功能进行区分的。可问题是，这两种不同依据的分类结果能否真的对应起来，例如《论语》亦可称经，但其中更多属单行之句，又都言简意赅；集部书籍多偶句韵词者，却不能称经。刘师培的这种分类，也正是他一贯注重经书与骈文思想的体现。

刘师培对于文体的辨析，并非仅仅停留在对“文”的考辨和对书籍的大致分类上，他对各种具体文体的辨析也非常仔细。如《论文杂记》卷5：“箴者，古人谏海之词也。”“铭者，古人傲励之词也。”“碑者，古人记功之文也。”“颂者，古人揄扬之词也。”他对文体的辨析多从小学入手，通过训诂探寻文体的本义。如《论文杂记》卷4：“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歌者永言之谓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也。”其自注中又征引《说文》、戴侗《六书故》引唐本《说文》、《尔雅·释乐》、《汉书·艺文志》、《文心雕龙》等为证。刘师培的文体学论述中，涉及的文体种类非常多，如《论文杂记》卷5、6、7中，就对箴、铭、碑、颂、杂文（包括答问、七体、连珠、上梁文、祝寿文等）、书说、奏议、敕令、传、记、诗赋等许多文体进行了探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涉及的文体种类同样极为繁富。

刘师培认为，在同一种文体内，不同作家的创作主题和艺术风格各不相同，原因在于其所本不一。《论文杂记》卷12中，他以唐、宋之文为例，认为韩、李之文出于儒家，柳宗元

之文出于名家，苏洵之文出于兵家，苏轼之文出于纵横家，王安石之文出于法家，明清学者之文都源自先秦诸派。同为诗体，刘师培认为杜甫、李白、孟浩然、苏轼、储光羲、王维、黄庭坚等人所自学派亦不相同。将不同作家同一文体的作品风格分别对应到早期的各大学派，堪称刘师培文体辨析上的一大特色。

二、“与时代而迁变”的文体发展观

刘师培在论述文学发展时，具有着清晰的历史时段感。从大的方面讲，他所论述古代文学在先秦、汉魏六朝、唐宋、明清四大阶段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从细的方面讲，每个大的阶段中又可以区分为若干小时间段，如其《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绪论”中，就将自西汉以迄唐初的文学断为两汉、魏、晋宋、齐梁、梁陈、隋及初唐六期，每一时期中的文学都在不停地产生变化。正是在这种文学发展观的影响下，刘师培认为文体一旦形成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的迁移不断发生变易。《论文杂记》卷9中指出：“文虽小道，实与时代而迁变。故东京之文，殊于西京；魏代之文，复殊东汉。文章之体，在前人不能强同。”在刘师培的相关文体学论述中，文体会随时代变迁而不断产生嬗变的意识处处可见。

刘师培对中国古代文学文体总类进行了观照，注意到古代文体总类在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变易，尤其善于通过对各种文体的溯源，考察新文体与旧文体之间的承袭关系，由此发现不同文体间的互动关系。如《论文杂记》卷14：“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盖赋列六艺之一，乃古诗之流。”文章多方举证，说明“诗赋虽别为一略，不与纵横同科，而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职”，由此判定赋体本出于诗，赋的出现可谓是诗歌发展历程中的一种新变。又如《论文杂记》卷18：“汉人乐府之诗，如《孔雀东南飞》数篇，咸杂叙闾里之事。叙事者，《春秋》家之支派也。乐府者，又乐教之支派也。是为《春秋》家与乐教合一之始。此

即金、元曲剧之滥觞也。盖传奇小说之体，既兴于中唐，而中唐以还，由诗生词，由词生曲，而曲剧之体以兴。故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近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远源也。”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知：乐府诗在演进过程中增添了叙事的功能，影响到后来曲剧的出现；唐传奇小说体中融入诗词曲中的音乐元素，直接导致了曲剧的形成。正是各种文体间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才使得中国古代文体的种类日渐繁多，文体格局日趋繁荣。

刘师培注意到文体的变迁不只是存在各种类之间的交融与影响，同一文体内部也会不断形成变化。《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第十四条《文章变化与文体迁讹》：“凡文章各体皆有变化，但与变易旧体不同。”“此皆在本体内之变化，而非以他体作本体之文。”“至于文章之体裁，本有公式，不能变化。”“苟违其例，则非文章之变化，乃改文体，违公式，而逾各体之界限也。文章既立各体之名，即各有其界说，各有其范围。句法可以变化，而文体不能迁讹，倘逾其界畔，以采他体，犹之于一字本义及引申以为曲为之解，其免于穿凿附会者几希矣。”文体的变迁存在着量变与质变两种，文体质变会影响到新文体的出现或旧文体的消亡，而文体量变仅仅存在于文体内部，是同一文体的文体特征的变迁，包括体制功能或艺术风格的变易，但文体的本质属性并没有形成改变。如《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文心雕龙》诸书，或以魏代文学与汉不异。不知文学之变迁，因自然之势。魏文与汉不同者，盖有四焉：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质直而屏华，三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刘师培通过例证说明，汉魏之际书檄、论说、奏疏、诗赋等文体在艺术风格上产生了明显变化，由此指出刘勰等人认为汉魏文体相同的论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形。这些文体在艺术风格上形成的变异，都属于文体内部中的量变过程，这种量变又是促使文体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原因。《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中古时期多种文体的风格变异进行了

考察，如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盖汉、魏以降，史传一体，均由实趋华，而史才则有高下也。”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略》：“盖南朝之诗，始则工言景物，继则惟以数典为工。”著者通过对不同文体风格变异的探寻，分析当时文学风格的总体流变，所得结论也更令人信服。

刘师培还对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大趋势进行了评述。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曾言：“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①刘师培尽管也非常推崇先秦文学，认为：“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汉非之排□，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词，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论文杂记》卷3）“东周以降，文体日工”（《文说·耀采篇》），但他更认可中古时期（尤其是东汉）在中国文体发展史上的特殊意义。《文说·和声篇》云：“秦、汉以降，文体日滋。”《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提出：“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刘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一文在对秦汉文体进行过较为充分的梳理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古代文体学观念至秦汉已经日益明确，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主要文体也多在秦汉时期基本定型”。^②刘师培将中国文体大备的时段确定为东汉时期，可谓是对章学诚“文体备于战国”说的拨正。同时，刘师培还对影响各种文体嬗变的原因进行了探寻。如《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略》中指出，自宋代颜延之以来的矜言数典、富博为长之风的兴起，永明以来声律说的盛行，都是导致各种文体形成变异的原因。晋末裴松之奏禁立碑，导致志铭之文的兴起，则是政治直接影响文体兴变的典型例证。

①（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63页。

② 刘跃进：《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三、刘师培的文体研究方法启示

刘师培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其与文章学研究的紧密结合。刘对文体的研究，很少是专辟章节的专题研究，大多是融入到对古代文学的总体研究当中。但在对各种文体进行具体论述时，多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入手来考察各种文体的特点及其流变。在刘师培众书中，“体”、“文体”、“体裁”等概念经常出现，所指或同或异。如其《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第十四条《文章变化与文体迁讹》中有句：“凡文章各体皆有变化，但与变易旧体不同。”“至于文章之体裁，本有公式，不能变化。”《论文杂记》卷1：“故经、论、律三类，可以该古今文体之全。”上面句子中的“体”、“体裁”、“文体”等词，都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体”或“文学体裁”有着相同的意思。必须注意的是，刘师培所谓的“文体”并非都作体裁讲，如其《中国中古文学史·魏晋文学之变迁》“嵇阮之文”一节6次用到“文体”一词，如“别有《答伏羲书》一书，亦足以窥阮氏文体之概略。”（嵇康）“别有《卜疑》、《家诫》、《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其文体均变汉人之旧。”“魏晋文章，其文体与阮氏相近者，为伏羲《答阮籍书》。”这些“文体”基本都指文学的体式特征或作家的艺术风格，而并不专指文学体裁。刘师培在辨析文学体裁及其特性时，时刻注重着各种体裁在体式与风格上的差异，体现出鲜明的文章学意识。也正因为此，在他的文体学论述中处处浸透着文章学的内容。

刘师培注意到不同的文体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写作要求，如《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第七章《论文章有生死之别》特别论述了如何使史传体文章具有活跃生气的具体写法，并指出“其他各体亦莫不然”，由此得出“记事之文有数句传神之语，文章前后即活；有韵及四六之文，中间有劲气，文章前后即活”的结论。刘师培认为，不同文体在写作技巧上可能具有相同的要求，同一种文体却又可以采用不同的

写作技巧。如《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第十一章《论文章有主客观之别》：“体裁虽同，而作法则殊。”“文章各体虽非尽属主观，而如情文相生之哀吊，校练名理之论辨，援事抒意之传记，固应以唯心为尚也。”第十九章标题直接提出：“论记事文之夹叙夹议及传赞碑铭之繁简得当”。第二十一章《论文章宜调称》：“但无论讲名理，抒性情，或显或隐，要须求其相称，始不乖体。譬如讲名理之文，若晋人‘声无哀乐’、‘言不尽意’等论，宜有明隽者即于明白晓畅中饶有清空韵致也。倘有腐说，或过用华词，即为不称。又如深情文字，若吊祭、哀谏之类，应以缠绵往复为主，苟用庄重陈腐语，即为不称。序文之说经考据者固应庄重，而不可出以明隽或轻纤，但笔记、小说、文集诗词之序，若过于庄重，亦为不称。故知名理之文须明隽，碑铭须庄重，哀吊须缠绵，咏怀须婉转：相体而施，固非一成不变也。”文体学与文章学本身就具有密切的联系，文体学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各种文体的写作特点，文章学研究又必然注意到所作文章的体裁特点。刘师培将其文体学研究与文章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做出了良好的示范。

注重实证，善于借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由此做到言必有据，是刘师培文体学研究的又一特色。刘师培出身经学世家，自小研习传统经籍，在经学、小学、史学、诸子学等多个领域都有着很高的造诣。所以，他在考辨学术源流、考察文体流变时，往往能旁征博引，所得观点令人信服。如其《中国中古文学史》论述汉魏、魏晋、宋齐梁陈等不同时段的文体变迁，首先列举经典作品，然后辅以《后汉书》、《隋书》等史家记载，参以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刘知几《史通》的相关评述，范文、参引和案语三者交替出现，征述史料极为丰富，在没有电子检索的当时，若非熟谙经史何能至此！他虽然随时引述古人观点，但并不迷信古人成说，或略作点评，得心应手，或予以辩，主见自出，更多表现为与古人对话的研究态度。同时，刘师培还特别善于借鉴外来理论，或者将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西方文学的演进作横

向比较。如《论文杂记》卷1、卷2对印度佛书及英儒斯宾塞耳“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等观点的引述，无不表现出对国外研究的关切。在《文章源始》中，为了说明中国文章在唐代韩、柳之后开始出现由排偶趋向单行、由深趋浅、由简入繁、由骈俪趋长短相生之体的态势，刘师培马上联系到涩江保《罗马文学史》：“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由此感叹：“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广博的学术功底、开放的学术思维和敏锐的学术嗅觉，在刘师培的文体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刘师培在文体学研究时，对于他人的研究方法也多有借鉴。总体而言，刘师培的文体研究思路，基本都是对刘勰《文心雕龙》的承袭。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自称在考辨文、笔中的各种文体类别时，采用的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方式。^①与《文心雕龙》相比较，刘师培对于文体的论述就显得分散得多，但如果我们将其所论述的内容加以归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一是考察文体的源流；二是考辨文体的内涵；三是运用经典作品以阐释文体特征；四是总结具体文体的写作要点。以上四项内容，正可归结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刘师培对《文心雕龙》文体学研究方法的吸收可见一斑。刘师培对于近代学者的借鉴也很多，阮元、章学诚、章太炎等人的研究方法都曾对其产生过较多影响。如钱基博就认为刘师培“论文章流别同于诸子，推诗赋根源本于纵横，出之章学诚者也。”^②刘师培对研究方法的借鉴并不局限于国内，《论文杂记》卷1即在印度佛书分类方式的启发下，将中国古代文章区分为经、论、律三大类。他的《甲辰年自述诗》写道：“高邮王氏雒山刘，解字知从辞气求，试证西方名理学，训辞显著则余休。”“道教阴阳学派异，彰往察来理不殊，试证西方社会学，牖陈事物信非诬。”明确表述了对西方研究方法的浓厚兴趣。

刘师培在古代文体学研究过程中，分明透

露出一一种深深的责任意识，一种传承祖国传统文明的历史责任感。刘师培本有心于政治，尽管在政治路途中污点甚多，但他关心国运、心系民族的心思却不容置疑。他在《甲辰年自述诗》中写道：“一从辽海煽妖氛，莽莽东陲起战云。四海旧愁一惆怅，何时重整却胡军。”表现出对国家兴亡的无比关切之情。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民族前景一片迷茫，是他内心无比愁苦的重要原因。随着国运的衰落，民族文化自信随之黯然，传统国学成为革命的对象。在崇尚学习外国文化的浪潮中，刘师培深深地感受到传统民族文化面临消亡的危险。他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感叹：“近岁以来，作文者多师从龚、魏，则以文不中律，便于放言，然袭其貌而遗其神。其墨守桐城文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夫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可言，乃及时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谓非中国文学之厄坎？”面对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他在《论文杂记》卷2中说道：“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沦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可见刘师培既重视白话文开启民智的功能，又担心国学传统被中断。汪春泓先生指出：“刘氏忧患本国文化、文学被异域文明所淹没，因此，论文学史，首先要捍卫汉字和本民族文学之特质，辨析夷夏之歧异。”^③刘师培出身于经学世家，对于以经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浸淫极深，在他心中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

①（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7页。

②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傅道彬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③ 汪春泓：《刘师培文学思想概述》，参见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8页。

豪感，有着光大民族精神的强烈欲求，同时又有因国运衰败而难以消遣的迷茫和愁苦。正是这样一种对国家政治和文化命运的高度关切，使得他的文体学乃至文学研究更具历史厚重感，亦更具一种难以复制的时代魅力。

余 论

刘师培深受扬州学派滋养，以精通小学、经学等傲视文界，加之用力勤奋，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又不固步自封，因此在文体学、文章学等领域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以今天的学术眼光重新审视刘师培的文体学研究，并非是完美无缺。例如他过于推崇骈文而贬低古文，将运用偶语韵词视为文体正宗的唯一标准，明显有失偏颇。又如他对许多后来文体或作家风格强行溯源，往往也有失牵强。但是，在历史剧变的时代，刘师培既承袭了古代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又成功地将所接触的外来理论融入其中，为后来研究者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刘再华认为刘师培承袭阮元，“对于声韵、骈偶、藻采的强调虽然走向了极端，最终流于形式主义，但他们企图借此把文学从经、史、诸子之学中离析出来的努力符合文学发展的方向，因而应该肯定。他们的文论话语虽然未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却已经显露出中国文论由经学向美学转换的某些信息。”^①诚然，刘师培的许多文体学观点都有着可以商榷的地方，但他对于民族文化的热爱、对于传承国学的执着，却是我们每一位学人都应学习的。

本文作者：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马 光

① 刘再华：《近代经学与文学》，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5~136 页。

On Liu Shiwei's Stylistics Ideas and Research Methods

Ke Zhenchang

Abstract: In his short academic career, Liu Shiwei left to later generations with lots of literature works which are mostly related to the stylistic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to "text", he concluded that the prose is the original of all the style, and began to find the roo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related styles. Liu Shiwei believed that style would change with the time. He thought that there was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literary styles, and the change would continue inside a style. He pointed out that most styles appeare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biggest characteristic of Liu Shiwei's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stylistics is that it was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article studi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mpirical, good at drawing lessons from Chinese and foreign research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no matter ancient or modern, made his research more reasonable. In the process of his research, Liu Shiwei showed deep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which gave his research a special historical sense.

Keywords: Liu Shiwei; style; the article studies; prose; research methods